

染布匠：妙手染出七彩布匹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染布匠,顾名思义就是专业从事布匹浆染的人。自从人类开始纺织穿衣以来,染布这个行当就应运而生,它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世代沿用的一种传统手工艺,历史也相当悠久了。染布机的雏形可追溯到商周时期,人们出于对色彩的喜爱,所以就有了染布匠。在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,为了节省,人们对衣服布料都是物尽其用。在改革开放以前,染坊的生意如日中天,但随着纺织印染工业的快速发展,染布这一老行当逐渐萧条,以至于现在很难觅到染布匠的身影。

染布艺术历史悠久

“收布取布啰,收布取布啰……”上世纪七十年代,在记者的记忆中,经常会有人拉着架子车,用一个铁皮卷的喇叭筒子边走边卖力地吆喝,这就是记者对染布匠的最初印象。染布匠们隔三差五地在村头出现,人们将半个竹签交予染布匠对号后,才能找到所染的布匹或衣物。

采访染布匠让记者着实费了一番周折,多次寻找过去从事染布的人,大多是年老的都已经过世了,年轻的改行从事其他行当了。前不久,记者在沈丘贡土布的传承人那里得知,在沈丘县石槽集乡至今

染布是个细心活

张京华说,在过去由于颜料单一,人们多穿蓝色衣服,土法染蓝布特别流行。染蓝布主要是抽靛脚子,用抽水葫芦抽出沉在染缸底的“靛脚子”。再下靛,将土靛放在簸箩里,在缸水中淘洗,使细靛漏下,再把碱和石灰加入水中。接下来是疏缸,下靛后用缸棍子搅动缸水,用缸碗看颜色深浅,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染布,在缸中间悬挂一个用铁丝编成的网状“缸罩子”,把缸水分成上、下

还有一位坚守传统工艺的染布匠,他叫张京华,虽年近古稀,仍然开着小染坊,维持日常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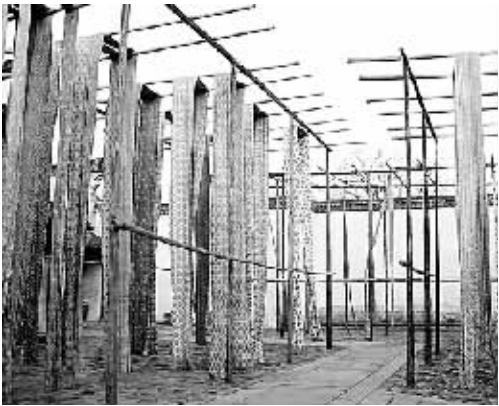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想身强力壮,在家开个染坊。”张京华说,这个在当时农村流行的口头禅,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染布匠们高强度的体力劳动。大量的布匹浆染,别说在夏天,就是在寒冬腊月,染布匠身上也经常会大汗淋漓。张京华从事浆染行当已经有 50 多年了,他的家族世代都是以染布为生,对于染布所有的工序他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在张京华家不大的小院里,摆放着染布所需要的工具,

两层,把布浸在上层,用手操作,染半小时后取出,叠起来放在缸口上的“担缸板”上轻轻压出水分,摊开晾干,布就由黄变绿、由绿变蓝了。第一次染出的是浅蓝色,晾干后再染一次就深一层,愈染愈深,由浅而深的颜色依次是月白色、二蓝、深蓝、缸青,最深的蓝色近于黑色,称为“青”。

在整个染布行当中,用途最广泛就是老蓝子印花布了。一般所染的布料在制

小炉、四方形火水铁罐和各种颜料。张京华回忆说,在他年轻时,染布的行业很是吃香,因为那时候大家穿的都是自家纺织出来的老土布,做成衣服或被褥就得浆染成各种颜色。那时候一个公社染布的就有十几个,生意好得无法形容。每个染坊都是雇人下乡接收需要染的布料,然后再将染好的布料送上门。每逢年关生意好的时候,实在忙不过来,他们会上门就地替主家染布。不用说,也是立等可取——把颜料注入火水罐搅匀,然后放进布料,大约浸一个小时,主家认为颜色满意,生意便完成了。

作时,先将白布下水浸泡,用豆面、石膏搅成糊状,用硬造纸制版,刻上花、鸟图案,将版铺在白布上,用刮刀印制,然后投入染缸中洗染,阴干后剥落图案上的附着物。由于刻版和刮灰浆的原因,点线既不能太大,又不能太小。太大的点或线段,灰浆容易在染色时剥落;太小的点,灰浆又不容易附着。印花布在改革开放前,在农村非常流行,深受人们的喜爱,被作为陪嫁被褥、衣服的必备品。



染布坊晒布 (资料图片)

传家本领无人传承

张京华说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这话一点也不假,染色这行当,运用之妙,全在一个悟性,染料的分量、水的温度,种种因素最终决定了染出的颜色。

比如说蓝印花布就是采用传统的漏版刮浆的防染工艺,它是在蜡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蓝印花布所采用的镂空花版印花技术很古老,就是在木板或浸过油的硬纸板上雕刻、镂空制成花版。印染时,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染料或色浆,除去镂空版,花纹便显现出来。如果涂刷色料掌握不好,就会出现印色失调。在印制过程中要经过雕版、调浆、刮浆、下靛、搅缸、入染、漂洗、晾晒、踩滚等 9 个重要的环节,每个环节都有玄机,稍有操作不好,染出来的布就成了民间所说的“花狗屁股”。在整个染布行当中,最能展示染布匠技艺的就是“回染布”,衣被褪色后要再染色就是回染,有原色的,也有要求染成其他颜色的。如果将蓝色的染成咖啡色的,那就需要染布匠的超强技术,把握不好,一件衣被或许就染得不伦不类。染好一件衣物讲究印染细腻,图案完美,这就体现在技巧的精湛上。张京华感叹说,如今自己虽然有精湛的传家本领,由于土法染布没有市场,儿女们也都不愿继承,他的这门手艺即将失传了。

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官话



资料图片

■冯忠方

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博学多才,却不善辞令,说话时常夹有“啊啊”的习惯语。他是广东人,说起“官话”来夹杂着许多广州口音,叫人听不懂。

“戊戌变法”初期,梁启超名噪京城,光绪帝久闻其名。1898 年 7 月 3 日,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。依清朝旧制,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予翰林或内阁中书,赏四品衔。

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,却只被赐了个小小的六品顶戴,原因是梁启超

的“官话”说得实在差,把“考”字说成“好”,把“高”字说成“古”,光绪皇帝虽侧耳倾听,还是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“官话”。既然君臣对话似鸡同鸭讲,纵然君王满腔诚意,臣子满腹经纶,也只能相顾茫然。

官话说不好,吃了不少亏。这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。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自幼长在北京,官话说得自然流利。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。夫妻二人,妇唱夫随,不消多时,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,在社交场合就逐渐得心应手了。

不一样的大学校长蔡元培

■阎泽川

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。有什么样的校长,就有什么样的学校;有什么样的校长,就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;有什么样的校长,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气质。

1917 年 1 月 4 日,隆冬的北京城大雪纷飞,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大的校门。这时,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,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致敬。
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这位“老爷”非但毫无傲慢之态,反而脱下自己的礼帽,气度谦和、恭恭敬敬地向校工鞠躬还礼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,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

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,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,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,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?正式就任之后,蔡元培宣布对那些在学校内打杂、打扫卫生的杂役和勤务人员一律要以“工友”相称,并为他们创造夜校学习的机会。

一位外国学者曾赞颂他说:“世界上大学校长很多,但没有一个校长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”在蔡元培先生身上,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,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。毛泽东在蔡元培先生逝世后,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: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。”

自谦为“乡巴佬”的钱钟书

■王文静

1980 年 11 月 28 日,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,钱钟书做了个演讲。这个演讲内容被记录下来,题目叫《诗可以怨》。当时,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,在座者没人能比得上他。

但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说,到日本来讲学呀,即使不必浑身是胆,也需要有斗大的胆。因为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,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,我面对你们这样的日本汉学同行,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。

他打比方说,他说面对日本汉学研究这个很大的宝箱,我像一个穷光棍,想来拿一点东西,但是没有号码锁,不懂开号码锁。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,眼睁睁地发愣。接着,他还幽默地讲了个意大利笑话《他发明了雨伞》:

有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,一天在路上走,忽然下起小雨来了,他凑巧拿了一根木棍子和一块方布,他还算急中生智,用木棍顶住方布,遮住头顶,回到家后居然没有被淋成落汤鸡。高兴得意之余,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一发明公诸于世。他听说城里有个“发明专利局”,就兴冲冲地拿棍连布,赶到城里,到发明专利局去报告和演示自己的发明创造。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听他说明来意,哈哈大笑,拿出一把雨伞,让他看个仔细。

钱钟书以此自喻为孤陋寡闻的乡巴佬,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,讲点新鲜的东西,实际上讲不出来,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,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,撑个门面,希望诸位不要笑话。钱钟书的笑话,令在座的教授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被学界视为“文化昆仑”的学问大家钱钟书先生,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、诚恳和大度。今天读来,依旧会让那些自命清高、唯我独尊的“学者”们汗颜。